

明末清初的词选词派与词统观念的嬗变

陈水云

内容提要 “词统”作为一种观念，在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开始形成，以《古今词统》的刊刻为标志。入清之后，邹祗谟、王士禛等编《倚声初集》，接续《古今词统》，并以其重变崇今的理念对云间派复古论统序观进行改造。陈维崧、顾贞观、纳兰性德等人，或标举苏、辛的直抒胸臆，或推崇李后主的舒写性灵，通过《今词苑》《今词初集》的编选践履以性情为本的统序观。从西泠词人的《见山亭古今词选》《古今词汇》到浙西词派的《词综》，又在融合《古今词统》和清初诸词派思想的基础上新建了以周、姜为典范的雅正词统。在这一嬗变过程中，《古今词统》和云间派对清初诸词派统序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关键词 统序 本色 性情 雅正 观念史

在清代词学发展进程中，“词统”观念的形成对于词史的认识与词派的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^①。“词统”一词出现在明末崇祯年间^②，以《古今词统》为标志。进入清初，由于《古今词统》的巨大影响，作为观念的“词统”逐渐成型。它的具体涵义也有多种指向：一是指向“过去”，即唐宋时期形成的创作传统和审美风尚^③；二是指向“当下”，即清人所持有的统序观念，比照传统文化中的道统、学统、文统、诗统，在文体地位已得到普遍尊崇的清代，词应该也有一个自身的统序——“词统”^④。因为清初词坛流派众多，地域差异较大，对于词统的认识也就各有各的思考，相互之间还呈现出既传承又变革的关系。

一 立足本色，重变崇今

自陈师道批评苏轼“以诗为词”“要非本色”之论出现后，词学史上就形成了“词别是一家”“自有一种风格”的本色观念。这一观念在明代中后期仍然有很大影响，如何良俊有“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”之论，王世贞也有“词须宛转绵丽，浅至儇俏，挟春月烟花于闺幃内奏之”^⑤之说。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张綖在《诗余图谱》中所说的：“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，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，后

① 当前学界关于“词统”问题的讨论，主要有陈文新《论浙西词派的词统建构》（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2年第4期）、《论常州词派的词统建构》（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4年第2期），张宏生《统序观与明清词学的递嬗——从〈古今词统〉到〈词综〉》（《文学遗产》2010年第1期），沈松勤《明清之际的词统建构及其意义》（《第九届中国词学研究会年会暨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[第三卷]，2021年）。其中，张宏生、沈松勤二位先生的论述对本文多有启发，两位匿名评审专家也提出了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，特此致谢！

② 万历时期沈际飞《草堂诗余别集小序》已提出“嫡统”“闰统”的概念，但只是一种简单的比喻。

③ 参见拙文《唐宋词统在清初的恢复和重建》，《安徽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5期。

④ 参见《统序观与明清词学的递嬗——从〈古今词统〉到〈词综〉》。

⑤ 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，唐圭璋编《词话丛编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1册，第385页。

山评东坡词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”^①其后，王世贞又以李煜、晏氏父子、柳永、张先、秦观、周邦彦、李清照为词之正宗，因“温韦艳而促，黄九精而险，长公丽而壮，幼安辨而奇”而将他们视作“词之变体”^②，首次将唐宋词史上的重要词人划分为“正宗”“变体”两大系统，开始有了较为朦胧的统序意识。《古今词统》“杂说”在转录王世贞这段话后，有一条徐士俊的按语：“余谓正宗易安第一，旁宗幼安第一，二安之外，无首席矣。”^③将“正宗”“变体”改称“正宗”“旁宗”，是明代词学进一步把婉约、豪放与典范词人相联系，使其由辨体观念转变为统序观念的体现。在他们看来，词史上的确存在着一种由婉约、豪放分流共构的统序。

但是，元明以来，词坛上却存在着统序不明的情形，清人谢章铤指出：“明自刘诚意、高季迪数君而后，师传既失，鄙风斯煽，误以编曲为填词。……升庵、弇州力挽之，于是始知有李唐、五代、宋初诸作者。其后耳食之徒，又专奉花间为准则的，一若非金荃集、阳春录，举不得谓之词，并不知尚有辛、刘、姜、史诸法门。”^④“师传既失”指的是唐宋词统在明代的失传，虽然杨慎、王世贞为这一传统的恢复作出了一定的努力，但因其偏嗜五代、北宋，也造成中晚明词坛对于辛、刘、姜、史诸家之法门类而不知。正因为这样，卓人月、徐士俊在崇祯二年（1629）推出了反映词史全貌、具有集成性质的选本——《古今词统》。

这部选本对明代中叶以来词坛尊婉抑豪倾向的反拨，学界论之较多，但卓人月通过《古今词统》建构婉约与豪放“同体共源”统序的意图却为人所忽略。徐士俊认为“古今之为词者，无虑数百家”，然而一直以来存在着“‘铜将军’、‘铁绰板’，与‘十七八女郎’相去殊绝”的偏见。在他看来，“豪放”与“婉约”不可截然分开，“吾欲分风，风不可分；吾欲劈流，流不可劈。非诗非曲，自然风流，统而名之以‘词’”^⑤。就像“词”是由内意与外言共构而成一样，“古”“今”词史也应该是由婉约与豪放共构而成的^⑥。在明代，尊婉约抑豪放的观念广为流行，在徐士俊看来，“苏以诗为词，辛以论为词，正见词中世界不小”^⑦。他认为只要合乎择腔、应律、按谱、详韵、立新意的要求，无论是幽奇淡艳，还是敛放秾纤，种种风格都应予以肯定，它们之间是一种共存互补的关系。对这一观点，卓人月在《古今诗余选序》中也有明确表示，他指出“昔人论词曲，必以委曲为体，雄肆其下乎”，然而“委曲”（婉约）与“雄肆”（豪放）各有其弊，“夫委曲之弊入于妇人，与雄肆之弊入于村汉等耳”。本来，李白《菩萨蛮》《忆秦娥》以悲慨名世，其中实有“艳骨”，是“雄肆”与“委曲”兼具的典范，只是到了后来才体分两派。卓人月《古今诗余选序》云：“男有后主，女有易安，其艳词之圣乎！自唐以下，此种不绝。而辛幼安独以一人之悲放，欲与唐以下数百家对峙，安得不圣？”^⑧这里“圣”与“宗”意思相近，“词圣”亦即“词宗”，但没有了褒贬之义。在他心目中，应该有两类“词圣”——艳词之圣李煜、李清照和雄词之圣辛弃疾。所以，《古今词统》将“雄肆”与“委曲”并存，使二者互救其弊。据专家统计，《古今词统》入选数量较多的前十位宋代词人是：辛弃疾一百四十一首，蒋捷五十首，吴文英四十九首，苏轼四十七首，刘克庄四十六首，陆游四十五首，周邦彦四十三首，秦观三十八首，高观国三十四首，黄庭坚三十三首^⑨。这个名单中既有婉约词人，也有豪放

① 张铤《诗余图谱·凡例》“识语”，明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刊本，第3b页。

② 《艺苑卮言》，《词话丛编》，第1册，第385页。

③ 卓人月汇选，徐士俊参评，谷辉之校点《古今词统》“杂说”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6页。

④ 谢章铤《赌棋山庄词话》卷九，《词话丛编》，第4册，第3433页。

⑤ 徐士俊《古今词统序》，《古今词统》，第1—2页。

⑥ 参见沈松勤《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393—394页。

⑦ 沈际飞《诗余四集序》徐士俊评语，《古今词统》，第18页。

⑧ 卓人月《蟾台集》卷二，明崇祯间刻本，第68a—68b页。

⑨ 参见张宏生《经典传承与体式流变：清词和清代词学研究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197页。

词人，二者平分秋色，各占五席。

还有一点值得一提，过去多以苏轼为豪放词的典范，卓人月则认为辛弃疾较之苏轼更具典范性，故其中辛弃疾词入选数量接近周邦彦、秦观、高观国、黄庭坚之和，也是苏轼词的三倍。卓人月《古今诗余选序》云：“选坡词极少，以剔雄放之弊，以谢词家委曲之论；选辛词独多，以救靡靡之音，以升雄词之位。”（《蟾台集》卷二，第69a页）这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推尊稼轩的倾向，并在清初词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^①。

卓人月不但主张婉约、豪放并重，而且还主张“古”“今”并重。在明代，最流行的词选是《花间集》和《草堂诗余》。明代中叶，杨慎、吴承恩、陈耀文等开始有意打破《花》《草》一统天下的格局，他们所编的《词林万选》《花草新编》《花草粹编》等均超出《花》《草》范围^②，钱允治《类编笺释国朝诗余》、沈际飞《草堂诗余新集》更把选词范围延伸到明代，给予明词一定的空间和位置。特别是沈际飞的《草堂诗余四集》合“古”“今”于一体，开启了明代选词“古”“今”并重的先河^③。《古今词统》就是在这样的选词学背景下出现的，它的选目及选人，以《花间集》《尊前集》《草堂诗余》等为底本，但范围更宽，体例上也改《草堂诗余》分类法为分调法，一调有数体者则标“第×体”^④；篇目上则“稍摄诸家之胜”，对南宋至元明时期的词人词作重点采录。据统计，全书共选词两千零三十七首，词调三百三十二个，词家四百九十七人（不包括无名氏），其中隋唐五代五十三人，北宋五十八人，南宋一百五十八人，金代二十一人，元代九十一人，明代一百零五人^⑤；至于词作的选择，唐五代二百三十首，北宋三百七十五首，南宋六百五十五首，两宋女性词及其他共八十五首，金元一百七十二首，明代四百七十五首，年代不详者四十五首，南宋和明代为选录的重心。孟称舜《古今词统序》云：“自隋、唐、宋、元，以迄于我明，妙词无不毕具。其意大概谓词无定格，要以摹写情态，令人一展卷而魂动魄化者为上，他虽素脍炙人口者，弗录也。”（《古今词统》，第3页）很显然，《古今词统》改变了《草堂诗余》以征歌选调为择录标准的做法，以创作上的“摹写情态”和接受上的“动人魂魄”为入选标准（参见《明代词选研究》，第346页）。南宋以后的词正是在这一方面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，故《古今词统》于南宋以后词的选录数量大大超过唐五代北宋。这意味着晚明以后选词重心的一个重要变化，南宋词特别是明词得到充分的关注。明代入选词人相当于唐五代北宋的总和，入选词作占总数的四分之一，这不仅体现了“古”“今”并重的理念，而且传递了一种新的信息——崇今。

以上情况表明，《古今词统》在选词上传达了一种新的理念——重变崇今，即重视豪放词和明代词。张仲谋先生指出，这部选本努力超越流行数百年的《草堂诗余》的范围与手眼，试图建立一种大一统的词史统序，“即合古、今为一体，而着重强调今词即明词的地位；合婉约、豪放为一体，意在打破嘉靖以后贬抑豪放独尊婉约的倾向”^⑥。此一看法，诚为有识之见，即在时间上把古今统合起来，梳理出一条从唐五代经两宋再到元明的词史发展脉络^⑦，贯穿在这一发展脉络上的是婉约与豪放两条主线。孟称舜《古今词统序》云：“故幽思曲想，张、柳之词工矣……伤时吊古，苏、辛之词工矣……两家各有其美，亦各有其病，然达其情而不以词掩，则皆填词者之所宗。”^⑧它反对以婉约一系作为主

① 参见郑海涛《明代词风嬗变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45—246页。

② 参见陶子珍《明代词选研究》，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，第131、209、211页。

③ 参见甘松《明代词学演进研究——以唐宋词选的接受为视角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89—93页。

④ 《古今词统》在体式上标“第×体”的做法，当是吸收了程明善《啸余谱》的制谱体例。

⑤ 参见《古今词统》“本书说明”，第1页；“氏族”，第21—30页。

⑥ 张仲谋《论〈古今词统〉的词史建构》，《阅江学刊》2013年第3期。

⑦ 《古今词统》卷首的“氏族”，基本上是按时代先后排列词人的，这一做法影响到《御选历代诗余》。

⑧ 孟称舜《古今词统序》，《古今词统》，第3页。

线来看待词史,主张把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统合起来,认为它们应该是古今词史之双翼,共同构建了词体统序。

《古今词统》问世以后,在明末清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丁澎《正续花间集序》说:“珂月《词统》之选,海内咸宗其书,垂四十年。”^①卓回亦云:“余兄《词统》一书,成于壬申、癸酉间,迄兹四十五载。……方今词学大兴,识者奉为金科玉律。”^②从西泠词人毛先舒、丁澎、王昶的有关论述中,可看出《古今词统》重变崇今观念对他们思想的深刻影响^③。比如毛先舒说:“词句参差,本便旖旎,然雄放磊落,亦属伟观……何必抑彼南辕,全还北辙,抽儿女之狎衷,顿壮士之愤薄哉!”^④他反对尊婉抑豪的偏见,一并肯定豪放与婉约。丁澎还把辛弃疾抬到与杜甫并驾齐驱的位置上,指出:“苏子瞻、陆放翁诸君,特以迢丽纵逸取胜。至辛稼轩,其度越人也远甚,余子瞠乎后矣。……唐宋以来,言词必推辛,犹言诗必推杜,横视角出,一人而已。”^⑤而最能体现当时词坛对于《古今词统》观念之传承的是邹祗谟、王士禛合作编选的《倚声初集》,这一选本不但沿袭了《古今词统》体分正变的统序观念,还鲜明地体现了它对《古今词统》崇今理念的承续意识。王士禛说:“《词统》一编,稍撮诸家之胜,然亦详于隆万,略于启祯。邹子与予盖尝叹之,因网罗五十年来荐绅、隐逸、宫闱之制,汇为一书,以续《花间》《草堂》之后。”^⑥《倚声初集》所收为明万历至清顺治约五十年间的作品,其中明末词人一百五十一人(万历朝四十五人,天启朝十五人,崇祯朝九十一人),清初词人三百六十二人。它一方面补《古今词统》之未备,另一方面又把选词重点放在《古今词统》所略之天启、崇祯两朝。其中,仅明末崇祯一朝就有九十一人之多,再加上清初顺治朝的三百六十二人,合计达到四百五十三人,占比超过全书九成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他们还以这一观念对云间派的统序观进行了调整。从《倚声初集》对明末清初词的选录情况来看,它是以云间派为环太湖流域词学之主源,以广陵、毗陵两大词人群体为核心,兼及柳洲、西陵、嘉兴、通州等地各类词人群体,集中入选作品较多的是云间派的陈子龙、李雯、宋徵舆、计南园,广陵、毗陵词人群的邹祗谟、王士禛、彭孙遹、董以宁,其他则有柳洲词人曹尔堪、通州词人陈世祥、合肥词人龚鼎孳、太仓词人吴伟业、常州词人黄永等^⑦。而云间派领袖陈子龙接受的是王世贞的统序观,标举的是南唐、北宋之旨趣——“境繇情生,辞随意启,天机偶发,元音自成”^⑧,追求纯情自然的“高浑”之格,以此推尊李璟、李煜父子,把周邦彦、李清照作为最盛期的典范。《赌棋山庄词话》云:“卧子之论词也,探源《兰畹》,滥觞《花间》,自余率不措意。”^⑨创作上以小令为主,喜为绮艳之篇,对南渡以后之作多所批评:“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,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。”(《幽兰草题词》,《幽兰草》,第1页)因此,《倚声初集》也秉承了云间派推重五代北宋的统序观,所选作品以小令为主,题材上偏重绮艳之作。全书二十卷,其中小令十卷,共一千一百四十首;中调四卷,共二百八十八首;长调六卷,共四百四十二首。小令数量远远超过中调、长调之和,这与云间

① 丁澎《扶荔堂文集选》卷二《正续花间集序》,清康熙五十五年(1716)文芸馆刻本,第22b页。

② 卓回《词汇缘起》,《古今词汇》,林登昱主编《稀见清代四部辑刊》,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,第5辑第100册,第23—24页。

③ 参见胡元翎、梁雪《徐士俊词学观的发展与明末清初词坛》,《学术交流》2018年第10期。

④ 毛先舒《毛驰黄集》卷五《与沈去矜论填词书》,清康熙间刊本,第11a—11b页。

⑤ 丁澎《梨庄词序》,周在浚《梨庄词》,清康熙间刻本,第1a—1b页。

⑥ 王士禛《倚声初集序》,邹祗谟、王士禛《倚声初集》,清顺治十七年(1660)大冶堂刻本,第3b—4a页。

⑦ 具体统计数据,参见闵丰《清初清词选本考论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,第66页。

⑧ 陈子龙《幽兰草题词》,陈子龙、李雯、宋徵舆撰,陈立校点《幽兰草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,第1页。

⑨ 《赌棋山庄词话》卷四,《词话丛编》,第4册,第3364页。

派“专意小令，冀复古音”的观念是一致的。然而，云间派标榜晚唐五代，力持复古之见，虽然对革新晚明词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但对于南渡以后的创作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，这一做法既不合乎词史实际，也不利于唐宋词统的发扬，故遭到王士禛、曹禾、毛先舒等人的批评。如王士禛认为云间派论诗“拘于方幅，泥于时代，不免为识者所少。其于词，亦不欲涉南宋一笔，佳处在此，短处亦坐此”^①。因此，他们对于云间派轻视长调的做法有所批评，指出：“词至云间，《幽兰》《湘真》诸集，言内意外，已无遗议。……所微短者，长篇不足耳。北宋诸家，大率如是。”^②于是，《倚声初集》对于长调也甚为重视，选入相关作品四百四十二首，占比约四分之一，对于清初之学南宋者亦予肯定。如王士禛评彭孙通《白苎》“春暮”一词时说：“词以少游、易安为宗，固也，然竹屋、梅溪、白石诸公极妍尽态处，反有秦、李所未到者……金粟刻意高、史，故多神妙之诣。程村亦首肯余言。”（《倚声初集》卷二〇，第15a页）由此可见，王士禛、邹祗谟等对云间派之复古和卓人月、徐士俊之崇今进行了整合，既推尊五代北宋、标榜婉艳，也不反对学习南宋，肯定辛、刘、陈、陆之“逸怀壮气”，赞美蒋、史、姜、吴之“穷姿构彩”，这一观念在清初其他词人词派身上也得到体现。

有必要说明的是，无论是《古今词统》还是《倚声初集》，无论是陈子龙之复古还是王士禛之崇今，他们都是立足于词体之“本色”谈论问题。因此，从崇祯到顺治，这一时期对于词统观念的认识，主要是围绕正宗与旁宗、婉约与豪放、北宋与南宋而展开的。

二 性情为本，观念重建

明末清初关于词统的认识，在立足于“本色”的论述模式之外，还有立足于“性情”的论述模式。这一论述模式发端于孟称舜《古今词统序》，徐士俊在评点之中将其做了具体的落实。孟称舜先是批评当时词坛流行的尊婉抑豪倾向，接着从抒写性情的角度谈到“词与诗、曲体格虽异，而同本于作者之情”，指出：“古来才人豪客，淑姝名媛，悲者喜者，怨者慕者，怀者想者，寄兴不一。或言之而低徊焉，宛恋焉；或言之而缠绵焉，凄怆焉；又或言之而嘲笑焉，愤慨焉，淋漓痛快焉。作者极情尽态，而听者洞心耸耳。如是者皆为当行，皆为本色，宁必姝姝媛媛，学儿女子语，而后为词哉？”^③这是明代词学将性情与本色相联系的重要表现，认为从言情角度看婉约、豪放都应予以肯定，从而确定了性情对于词统认知的重要意义。这一观念也为徐士俊所重视，据丁放先生分析，徐士俊常以“情”字作为评词的标准^④，张宏生先生还认为《古今词统》选苏、辛词独多，其中有突破以律缚情的意图^⑤。徐士俊在入清之后为徐喈凤《荫绿轩词》作序时说：“词与诗虽体格不同，其为摅写性情，标举景物一也。若夫性情不露，景物不真，而徒然缀枯树以新花，被偶人以袿服，饰淫靡为周、柳，假豪放为苏、辛，号曰诗余，生趣尽矣，亦何异诗家之活剥工部、生吞义山也哉？”^⑥这里对“情”又提出了一个“真”的要求，强调无论是婉约还是豪放，如果性情“不真”则“生趣尽矣”，失去了灵魂。徐士俊认为：“诗从情生也，而词之为道，更加委曲缠绵。大都胸中自有一段不容遏处，借笔墨以发抒之。故片刻镂心，遂足千古。若强为雕饰，无生趣以行其间，即不作可耳。”因此，当有人讥讽稼轩为

① 王士禛《花草蒙拾》，《词话丛编》，第1册，第685页。

② 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，《词话丛编》，第1册，第651页。

③ 孟称舜《古今词统序》，《古今词统》，第3页。

④ 参见丁放、甘松、曹秀兰《宋元明词选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，第344页。

⑤ 参见《经典传承与体式流变：清词和清代词学研究》，第198页。

⑥ 徐士俊《荫绿轩词序》，转引自冯乾编校《清词序跋汇编》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册，第116页。

词论,东坡为词诗,过于豪放,不类软温,他明确表示:“此在有情之人自能辩之。”^①也就是说,从“有情”角度来看,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皆未尝不可。

由孟称舜开启、徐士俊实践的性情论词统论述模式,得到陈维崧、顾贞观、纳兰性德等人的积极呼应和进一步拓展。他们一方面接续王士禛变革云间派的理念,另一方面又从孟称舜、徐士俊等人手中接过性情论词统论述模式,探索并选择合乎自己性情的典范和词统。

从历史眼光来看,阳羡派领袖陈维崧早年追随云间派,曾拜陈子龙为师,学习作诗填词。据学者研究,陈维崧初学词多有模拟《花间》的痕迹,如王士禛评其《点绛唇》“咏枕”有“《花间》句法”,又指出其小令近于《花间》,如“竹枝”之近于孙光宪,《三字令》之近于欧阳炯等^②。这一时期,他接受的是云间派所标举的五代北宋词统,认为:“齐梁之乐府,即唐宋之倚声也。自名花倾国,供奉擅俊逸之才;金缕提鞋,后主兼绮罗之质。……词有千家,业归二李。斯则绮袖之专门,红牙之哲匠矣!”他以李白、李煜为婉约之大宗(“词有千家,业归二李”),把柳永、李清照作为这一词统在后代的传衍:“若易安之婉婉清新,屯田之温柔倩媚,虽为风雅之罪人,实则闺房之作者。”^③也是对云间派统序观的再次弘扬。

陈维崧在康熙初年是广陵词坛的重要成员,参加过王士禛、邹祗谟等人组织的“题清溪遗事画册”唱和和红桥唱和,“这个唱和圈子的主要词家都主张词学花间和云间”^④。使他这一创作风格发生转向的是康熙五年(1666)的《念奴娇》唱和,其《念奴娇·被酒呈荔裳、顾庵、西樵三公,并示豹人、孝威、梅岑、舟次、方邨、希韩、女受、散木诸子,仍用原韵》“抒发怀才不遇、老大无成的悲慨,内心的不满和牢骚溢于言表。词意发露,气势张扬,学辛而有自家姿态”^⑤。由于遭际的坎坷和时代的变化,这时他的创作观念也发生较大变化^⑥。他对自己早年所作的绮艳之篇表示“大悔恨不止”之意,说自己“如今纵有疏狂兴,花月前生,诗酒浮名,丈八琵琶拨不成”^⑦,表现出对云间派统序观的反思意识,并在《词选序》中对当时词坛崇奉《花间》《兰畹》的风气表示出忧虑之情^⑧。陈维崧在这一时期对于豪放之作则多所推崇,例如他在写给好友史可程的《贺新郎》一词中说:“起从前、欧苏辛陆,为先生寿。不是花颠和酒恼,豪气轩然独有。要老笔、万花齐绣。掷碎琵琶令破面,好香词、污汝诸伶手。”^⑨又在读曹尔堪新词后感慨道:“老颠欲裂,看盘空硬句,苍然十幅。谁拍袁陶铁绰板,洗净琵琶场屋。击物无声,杀人如草,笔扫婉毫秃。较量词品,稼轩白石山谷。”^⑩表现出对豪放之作的欣赏之意,对白石之清空、山谷之苍劲也有所肯定。

在陈维崧看来,无论是婉约还是豪放,清空还是苍劲,只要出于真性情,都应予以认可。这一点是对云间派的变革,也是对王士禛、邹祗谟词学观念的发展。他还从性情论角度解释了文体风格多样性的成因,认为文体风格的差异与人的性情差异密切相关。陈维崧指出:“夫言者,心之声也。其心慷

① 徐士俊《雁楼集》卷二〇《与邵于王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,第17册,第408页。

② 参见丁惠英《陈维崧及其湖海楼词研究》,台湾复文书局1992年版,第200—201页。

③ 陈维崧《陈维崧集·陈迦陵体文集》卷七《金天石吴日千二子词稿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,上册,第387页。

④ 刘东海《顺康词坛群体步韵唱和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,第87页。

⑤ 葛恒刚《“江村唱和”“广陵唱和”与清初词坛稼轩风的演进》,《江苏社会科学》2018年第5期。

⑥ 参见严迪昌《清词史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,第194—200页。

⑦ 陈维崧《采桑子·吴门遇徐案之问我新词赋此以答》,《陈维崧集·迦陵词全集》,中册,第996页。

⑧ 参见《陈维崧集·陈迦陵散体文集》卷二《词选序》,上册,第54页。

⑨ 陈维崧《贺新郎·奉赠蓬庵先生仍次前韵》,《陈维崧集·迦陵词全集》,下册,第1557页。

⑩ 陈维崧《念奴娇·读顾庵先生新词兼酬赠什,即次原韵》,《陈维崧集·迦陵词全集》,下册,第1329页。

慨者，其言必磊落而英多；其心寡爱者，其言必和平而忠厚。偏狭之人其言狷，跌宕之人其言靡，诞逸之人其言乐，沉郁之人其言哀。”^①对于这一点，其词友徐喈凤也有较为具体的说明：“词虽小道，亦各见其性情。性情豪放者，强作婉约语，毕竟豪气未除；性情婉约者，强作豪放语，不觉婉态自露。故婉约固是本色，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。”^②有意思的是，徐士俊、陈维崧都为徐喈凤《荫绿轩词》作过序，在论词观念上也比较接近，这说明阳羡派对徐士俊的主情论是有所了解的^③。不过，陈维崧和徐喈凤在对性情的认识上，与晚明词坛对于“情”的强调不尽相同。在《草堂诗余四集》《古今词统》《精选古今诗余醉》等书中，所谓“情”主要指的是“风月”“花柳”“歌舞”之类男女享乐之情（《宋元明词选研究》，第323页）；而阳羡派所谓的“性情”则是从生活中引发出来的包含个人经历、民生疾苦、国家兴亡等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的“性情”^④。因此，在《今词苑》序中，吴逢原提出了“言愁之作古今不绝，而缠绵凄恻，如诉如慕，莫若诗余之言愁，可以绘神绘声”的观点，这也决定着他们在统序选择上更倾向于苏、辛一脉^⑤。在他们心目中，东坡、稼轩才是其师心之所在，故为词亦应如苏、辛一样直抒胸臆，展衍铺陈。陈维崧便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东坡、稼轩诸长调，又騷騷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。”^⑥

从直抒胸臆的性情论出发，陈维崧与其词友们编选的《今词苑》，着力消解自云间派以来独尊南唐、北宋的复古论词学观^⑦。该选是一部在时间上接续《倚声初集》而编的“今词选”，所收皆为康熙最初十年间的作品。全书凡三卷，共收词人一百零九家，词作四百六十一首，其中小令七十九人二百一十四首，中调四十二人九十五首，长调六十人一百五十二首，中长调比例已超过小令。它在规模上不及《倚声初集》宏大，在编选思想上却有着鲜明的特色，一方面秉承《古今词统》的崇今理念，另一方面是对不同地域、词派、风格的肯定。据李康化、闵丰等学者统计，《今词苑》所选包括云间词人十四家、西陵词人十家、柳洲词人十四家、广陵词人十二家、兰陵词人十二家、阳羡词人十五家^⑧，这六大词人群体构成了清初东南词坛的基本版图，正如徐喈凤所说，“选词者兼收并采，斯为大观”^⑨。从入选作品数量来看，入选较多的是龚鼎孳三十一首，曹尔堪二十八首，邹祗谟二十四首，吴伟业二十一首，陈维崧十八首，王士禄、吴本嵩各十三首，吴逢原、黄永、朱彝尊、沈谦各十二首，纪映钟十首，王士禛、彭孙遹各九首，钱继章八首，这一数字大致反映了这些词人在康熙初期的词坛地位。但它把龚鼎孳、曹尔堪、吴伟业提到了前三位，取代了《倚声初集》以云间三子为首的排序，是一个很大的变化。这当然与所收作品的时段有关，但更与编选者选词宗旨的变化有关。这三位词人是当时公认的词坛领袖，也因为他们入清后的作品颇多直抒胸臆之作。例如集中所收龚鼎孳《沁园春·赠陈其年》、吴伟业《满江红·蒜山怀古》《木兰花慢·过济南》、曹尔堪《满庭芳·重九》《凤凰台上忆吹箫·研露堂小集》《念奴娇·客园燕集》等，都寄寓了深沉的人生感慨。所以，潘眉《今词苑序》说这部选本中的作品是“不窅而不櫟，有伦而有脊”^⑩。

① 《陈维崧集·陈迦陵散体文集》卷二《董文友文集序》，上册，第42页。

② 徐喈凤《荫绿轩词证》，孙克强主编《清代词话全编》，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1册，第341页。

③ 参见梁雪《徐士俊文坛交游及其文学地位之重估》，《学术交流》2019年第9期。

④ 参见苏淑芬《湖海楼词研究》，台湾里仁书局2005年版，第86—91页。

⑤ 参见邬国平、王镇远《清代文学批评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675页。

⑥ 吴逢原《今词苑序》，吴逢原等《今词苑》，清康熙十年（1671）刻本，第3a页；陈维崧《今词苑序》，《今词苑》，第1b页。

⑦ 参见侯雅文《阳羡词派新论》，台湾学生书局2019年版，第236页。

⑧ 参见李康化《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》，巴蜀书社2001年版，第246页；《清初清词选本考论》，第16页。

⑨ 《荫绿轩词证》，《清代词话全编》，第1册，第340页。

⑩ 潘眉《今词苑序》，《今词苑》，第10a页。

应该说,从王士禛到陈维崧等人,主要着力在对云间派复古论统序观的改造,把《古今词统》重变崇今的理念纳入到他们的统序观中,为清词中兴的全面到来铺平道路。但是,纳兰性德、顾贞观不像阳羨派那样对云间派持批评态度,而是通过对诗学传统的引进和对词学传统的重塑,树立了以师法晚唐五代北宋为导向、以性情论和寄托说为内核的新观念。

其实,顾贞观、纳兰性德对陈子龙的词统观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,杨希闵有言:“《饮水》,远溯《握兰》,近挹《湘真》。”^①陈子龙词在他们所编的《今词初集》中选入二十九首,居全书之首,可见该书祈向所在。他们论词亦标榜五代北宋,如纳兰性德说:“仆少知操觚,即爱《花间》致语,以其言情入微,且音调铿锵,自然协律。”^②这是讲他对《花间》的推崇。而且,蒋景祁《刻瑶华集述》谈到纳兰性德和顾贞观对于温、韦的偏爱,认为:“温韦诸公,短音促节,天真烂漫,遂拟于天仙人,可望而不可即。”^③郭麐评价纳兰性德创作时也说:“《饮水》一编,专学南唐五代,减字偷声,駸駸乎入《花间》之室。”^④在《花间》、南唐、北宋诸家中,纳兰性德更为推重李后主。在他看来,李煜词兼有《花间》“贵重”与宋词“适用”之长,更有“烟水迷离之致”^⑤。他本人也以南唐二主为学习对象,故陈维崧以为“《饮水词》,哀感顽艳,得南唐二主之遗”^⑥。顾贞观谈到自己的审美崇尚时,也说“余则以南唐二主当苏、李,以晏氏父子当三曹,而虚少陵一席”^⑦,表示了对南唐二主、晏氏父子的服膺和推尊之意。这说明顾贞观、纳兰性德在统序观上和云间派是一脉相承的。但不同于陈子龙的是,对于其他不同风格的两宋词人,他们也能予以肯定。例如纳兰性德在《与梁药亭书》中谈到关于选词问题的意见时说:“愚意以为,吾人选书不必务博,专取精诣杰出之彦,尽其所长,使其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。……仆意欲有选,如北宋之周清真、苏子瞻、晏叔原、张子野、柳耆卿、秦少游、贺方回,南宋之姜尧章、辛幼安、史邦卿、高宾王、程钜夫、陆务观、吴君特、王圣与、张叔夏诸人,多取其词,汇为一集。”^⑧虽然这部设想中的《词选》未能编成,但由他们合作编选的《今词初集》也体现出“不必务博”“专取精诣杰出之彦”并兼法两宋的新观念。

《今词初集》不同于《今词苑》以调为序,而是以人为序,选录清初三十年间一百八十四位词人词作六百一十七首。它的最大特点是,“只要某位词人的词风、词作符合顾贞观与纳兰的审美观,他们在采录时是不吝篇幅的,不太考虑入选者之间的平衡问题”,这体现出“选家不拘门派,不徒囿于亲爱,惟以词取人”(《清初清词选本考论》,第36页)的态度,与《与梁药亭书》所言是一致的。这部选本首先突出了“云间三子”的地位,选入陈子龙词二十九首,宋徵舆词二十一首,李雯词十八首,分别居第一、六、八位,表明其对五代北宋词统的传承,目的是“为《兰畹》《金荃》树帜”^⑨。其他人选较多的是:龚鼎孳二十七首,顾贞观二十四首,吴绮二十三首,朱彝尊二十二首,丁澎十九首,纳兰性德、严绳孙各十七首,曹溶十六首,吴伟业、王士禛各十三首,陈维崧十一首,彭孙通十首^⑩。这些词人在审美倾向上存在较大出入,或取法北宋,或推尊南宋,或绮艳秾丽,或气格豪迈,却以其

① 杨希闵《词轨》“总论”,《清代词话全编》,第9册,第358页。

② 纳兰性德著,黄曙辉、印晓峰点校《通志堂集》卷一三《与梁药亭书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,第267页。

③ 蒋景祁《刻瑶华集述》,《瑶华集》,中华书局1982年版,第10页。

④ 郭麐《灵芬馆词话》卷一,《词话丛编》,第2册,第1504页。

⑤ 《通志堂集》卷一八《绿水亭杂识》,第343页。

⑥ 冯金伯《词苑萃编》卷八,《词话丛编》,第2册,第1937页。

⑦ 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续编卷一,《词话丛编》,第5册,第4543页。

⑧ 《通志堂集》卷一三《与梁药亭书》,第268页。

⑨ 鲁超《今词初集题辞》,纳兰性德《今词初集》,清康熙间刻本,第1b页。

⑩ 参见张宏生《清词探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,第255页。

有“精诣”而为顾贞观、纳兰性德所认可，表现出对云间派统序观的超越。

那么，什么是纳兰性德所说的“精诣”呢？我们认为是舒写性灵与寄托深厚。从舒写性灵来看，毛际可说：“今梁汾、容若两君，权衡是选，主于铲削浮艳，舒写性灵。”^①这和纳兰性德、顾贞观的创作思想是一致的。性灵者，性情也。近人谢章铤比较纳兰性德与朱彝尊、陈维崧的不同时指出：“竹垞以学胜，迦陵以才胜，容若以情胜。”^②以情为本，必然反对独尊一格，不为北宋或南宋所限。比如顾贞观的词，其弟子杜诏评曰：“若《弹指》则极情之至，出入南北两宋，而奄有众长。”^③从寄托深厚来看，无论是顾贞观，还是纳兰性德，都力主要有比兴之旨。纳兰性德《填词》云：“诗亡词乃盛，比兴此焉托。”^④顾贞观亦主张填词虽以《花间》《尊前》为尚，但要做到柔者不溺，艳者不浮，“殊有合乎比兴之旨”^⑤。比兴之论是从传统诗学中借用过来的，在纳兰性德看来，诗、词同源，词是从《诗》《骚》变化而来的，继承了“香草美人”“比兴寄托”的传统。纳兰性德指出：“自五代兵革，中原文献凋落，诗道失传，而小词大盛。宋人专意于词，实为精绝。”^⑥在性灵说、寄托论的基础上，纳兰性德还提出了“烟水迷离之致”的要求。何谓“烟水迷离之致”？纳兰性德未作任何说明，晚清的王鹏运、况周颐对此略有解释。王鹏运说：“矧填词固以可解不可解，所谓烟水迷离之致，为无上乘耶！”^⑦况周颐说：“填词口诀，曰自然从追琢中出……曰事外远致，曰烟水迷离之致。……李太白《惜余春》《愁阳春》二赋，余极喜诵之，以云烟水迷离之致，庶乎近焉。”^⑧所谓“可解不可解”“事外远致”，讲的都是含蓄蕴藉之美。李白二赋或喟叹春天之将逝，或因春日登高而怀远，皆有意在言外之思。综合李白的创作和王鹏运、况周颐的论述，可知“烟水迷离之致”就是以简约的文字传达含蓄隽永的意趣。《今词初集》所选以上述诸要素为准的，一方面将从五代北宋到明末云间派的词统接续起来，另一面试图从云间派复古论统序观中超越出来，将清初取向不同的词人词派纳入到他所确立的“新”统序中。从这个角度讲，《今词初集》与《古今词统》在词统建构上颇有暗合之处，即“统合”“集成”之义。前者以“性灵”“比兴”建构清初词坛秩序，后者以“婉约”“豪放”建构古今词史统序。

综上所述，无论是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羨派，还是顾贞观、纳兰性德，他们在进入词坛之初时接受的都是云间派的统序观，或追随云间派好为婉艳之篇（如陈维崧），或认同其所标榜的五代北宋词风（如纳兰性德）。他们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统序观念，或是对婉约、豪放持二元对立的态度，对不同地域、不同词人、不同词风均予认可（如《今词苑》）；或是突出性灵，崇尚比兴，反对“逞才”“使学”，极力标榜“烟水迷离之致”（如《今词初集》）。他们在创作上，一个步趋稼轩，一个追踪后主，成为婉约（“委曲”）、豪放（“雄肆”）两大统序在南北词坛的实际传承者。

三 以周、姜为典范，确立雅正词统

大体说来，从《古今词统》到《倚声初集》存在一个变化，陈维崧和顾贞观、纳兰性德对这一变化又作了进一步推衍。他们一方面受《古今词统》崇今理念之影响，热衷于“今词选”的编纂，着意

① 毛际可《今词初集跋语》，《今词初集》，第1a页。

② 《赌棋山庄词话》卷一二，《词话丛编》，第4册，第3472页。

③ 杜诏《弹指词序》，张秉戌《弹指词笺注》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545页。

④ 《通志堂集》卷三《填词》，第46页。

⑤ 顾贞观《柳烟词序》，郑景会《柳烟词》，清康熙间红萼轩刻本，第2a页。

⑥ 《通志堂集》卷一八《绿水亭杂识》，第336页。

⑦ 《蕙风词话》卷一，《词话丛编》，第5册，第4413页。

⑧ 况周颐撰，屈兴国辑注《蕙风词话辑注》补编卷一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356页。

呈现明末清初的“中兴”局面；另一方面又将从《古今词统》或云间派那里推衍而来的统序观转化为一种自觉的理念，并适应时代的发展，从不同角度改造旧观念、建构新观念。不仅如此，在为陈维崧、纳兰性德等人提供性情论词统论述模式之外，《古今词统》还为浙西词学群体建构雅正论词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，推动了清初词学由崇北宋向尊南宋的转变。

上文提到，从选词角度来讲，《古今词统》选南宋词六百五十五首，居各代之首；入选作品较多的前十位词人中，有四位被朱彝尊、厉鹗称为格律典雅派词人。张宏生先生认为这是明确地表示对典雅格律一派的提倡^①。而从评词角度来看，尚雅黜俗也是徐士俊词学思想的重要方面（参见《宋元明词选研究》，第349页），如“杂说”摘录张炎“词欲雅而正，志之所之，一为物所役，则失其雅正之音”之语，他评论道：“词取香丽，既下于诗矣，若再佻薄，则流于曲，故不可也。”（《古今词统》“杂说”，第34页）其实，论词尚雅不仅是南宋时期浙西地区的词学传统，也是清初浙西地区许多词人的共同追求，如海盐词人彭孙遹说：“填词之道以雅正为宗，不以冶淫为海。”^②西泠词人柴绍炳也说：“指取温柔，词归蕴藉，务全丽则，不失雅宗。”^③在这样的历史传统和时代背景下，建构雅正词统也就成为当时浙西词坛的共识，这从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以后出现的《见山亭古今词选》《古今词汇》《词综》中能够得到印证，它们将重心放在对《古今词统》统序观的变革上，其所标榜的对象从后主、稼轩变成清真、白石，且将其落实到具体选目上。

陆次云、章炳辑《见山亭古今词选》，有康熙十四年刻本。此选本共选唐宋金元明清词三百六十二家七百七十首，其中唐宋八十八家二百八十八首，清代二百零八家四百六十首，清代占比近六成。唐宋词人中，排在前十二位的是辛弃疾、秦观、苏轼、欧阳修、李清照、蒋捷、周邦彦、李煜、陆游、刘过、贺铸和孙夫人；清初词人中，排在前十二位的是李天馥、梁清标、陆次云、曹溶、严沆、冯云骧、尤侗、陆进、王士禛、曹尔堪、赵进美和朱彝尊^④。其所选唐宋词中，辛弃疾排第一，苏轼排第三，陆游、刘过并列第九，其他均为风格婉雅之词人。这说明编者对《古今词统》过重稼轩和豪放的观念有所修正。第一名辛弃疾（十七首）与第二名秦观（十六首）只有一首之差。从词人年代归属来看，南唐一家，北宋五家，南北宋之交一家，南宋五家，较之西泠、广陵、阳羨诸词派或群体，其对五代北宋的尊崇有所弱化。从唐宋词选目和选人来看，似乎南宋典雅派词人未能引起重视。其清词选录以李天馥、梁清标为首，不选吴伟业、龚鼎孳等公认的词坛领袖，也不选陈维崧、纳兰性德等独具个性的词人。这透露出一种新的观念——以雅为宗，确立了清词的新典范——李天馥和梁清标。许虬评梁清标《棠村词》：“春雍和雅，有钧天广乐气象也。”^⑤陈廷焯评李天馥《菩萨蛮》（落红万片花如雨）：“音节自然合拍，温丽和雅。”^⑥值得注意的是，严沆在序文中特别提到这部选本在《古今词统》之后，树立了一个从清真到白石、梅溪的新词统——雅正词统。浙西词人陆次云、曹溶、严沆、陆进、曹尔堪、朱彝尊分列第三、四、五、八、十位（曹尔堪、朱彝尊并列第十），这表明浙派词人正从清初诸词派中脱颖而出，接续了自周邦彦而来的雅正词统。在他看来，经过明词中衰之后，清初词坛再度焕发光彩，大有“清真、白石、梅溪之遗调未坠”^⑦的气象。

严沆这篇序文还表现出对清真雅词的着意强调，并以之为南宋雅词之“源”：

迨至宋同叔、永叔、方回、叔原、子野，咸本《花间》，而渐近流畅。耆卿专主温丽，或失

① 参见《经典传承与体式流变：清词和清代词学研究》，第200页。

② 彭孙遹《松桂堂集》卷三七《旷庵词序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第125册，第255页。

③ 柴绍炳《柴省轩文钞》卷七《平远楼外集序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第55册，第172页。

④ 具体统计数据，参见《清初清词选本考论》，第175—176页。

⑤ 梁清标著，梁新顺点校《棠村词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5页。

⑥ 陈廷焯《云韶集》卷一四，孙克强主编《白雨斋词话全编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上册，第346页。

⑦ 严沆《见山亭古今词选序》，陆次云、章炳编《见山亭古今词选》，清康熙十四年刻本，第7a页。

之俚；子瞻专主雄浑，或失之肆。……故论词于北宋，自当以美成为最醇。南渡以后，幼安奋青兕之力，一意奔放，用事不休，改之、潜夫、经国尤而效之，无复词人之旨。由是尧章、邦卿别裁风格，极其爽逸芊艳，宗瑞、宾王、几叔、胜欲、碧山、叔夏继之，要其源皆自美成出。（《见山亭古今词选序》，《见山亭古今词选》，第1a—3a页）

这里在北宋词人中，批评柳永之“俚”和苏轼之“肆”，而以周邦彦为“最醇”；在南宋词人中，批评辛弃疾“一意奔放”，其追随者“无复词人之旨”，而高度肯定姜夔、史达祖在辛弃疾之外“别裁风格”。“宗瑞、宾王、几叔、胜欲、碧山、叔夏继之”一句表明，他们之间俨然形成了一个雅词统系——先是周邦彦，后是姜夔、史达祖，再次是张辑、高观国、黄机、蒋捷、王沂孙、张炎。尽管这部选本的选人选目与其论词旨趣并不一致，但它首次提出词史上存在着一个雅词统序。这对汪森《词综序》推尊姜夔和厉鹗《群雅词集序》标举周邦彦，应该是有影响的。

《古今词汇》的编者卓回（方水），为卓人月之从弟。该选始编于康熙十四年，刊刻于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共三编二十四卷，选录自唐迄清词人六百二十余家，收入词作近两千五百首，以调编次。从总体上看，它基本上接受的是《古今词统》的统序观念：第一，进一步强化了卓人月兼重古今、崇今趋新的思想。比如将选词重心放在明清两代，其中唐宋金元入选词人二百八十余人一千三百八十余首，明清两代入选词人约三百四十人一千一百七十余首（截至康熙十八年），清词入选数量（七百零七首）大大超出明词的入选量（四百六十四首）（参见《清初清词选本考论》，第182页）。第二，与卓人月一样主张婉约、豪放并重，不存高低轩輊之见，只论其是否表达作者性情^①。不过，据严迪昌先生介绍，该选初编乃卓回与周在浚合作完成，周氏在词学思想上推崇豪放，故初编中虽然将婉约、豪放并举，但豪放词人词作选录较多，比如排在前十位的词人是：辛弃疾八十九首，苏轼五十一首，周邦彦四十五首，吴文英三十九首，秦观三十六首，蒋捷三十首，程垓二十八首，刘克庄二十四首，陆游二十二首，周密二十二首^②。豪放词人不仅占有半数，而且在入选数量上也远远超过婉约词人。

但卓回的统序观在后来有所调整，“对豪迈之作则因受其时风靡词坛的浙西词派尊姜、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”（《清代辛稼轩接受史》，第559页），正如陆埏所说：“宋人偶涉淫褻者，俚鄙不可传，《词汇》严斥此种，然则是编之操三尺法也审矣！……操性情之正而严辨于文字间，以求当乎声音之道，则《词汇》一书诚发乎情、止乎礼义者也。”^③很显然，《古今词汇》的编纂对于《古今词统》有匡补纠弊之意，如严斥俚俗、强调性情之正等，在思想上与同期所编之《词综》颇多相通之处。因此，他联合家族子孙辈令式、松龄、长龄从事二编、三编的选辑，重视婉约与雅正，对周邦彦、姜夔、张炎等典雅派词人多所推崇。如《词汇缘起》第三条云：

盛宋诸贤如周美成，领大晟乐府，比切声调十二律，各有篇目。柳耆卿加增至二百余调，其时创为体格，方圆莫易，寸黍不爽，专求协律，以为标准，故命意或不高，修词或不工，非所计也。（引者按：此处颠倒了柳永、周邦彦的顺序。）至张叔夏辈，留意文义，摘词选调，风气大别，其所著《乐府指迷》（引者按：实为《词源》），允为后学津梁矣！（《词汇缘起》，《古今词汇》，《稀见清代四部辑刊》，第5辑第100册，第22页）

这里对柳永命意不高、不计工拙表示不满，而着重强调张炎等能“留意文义”。卷首“词论”部分首选张炎《词源》，第一则称赞周邦彦“作词浑厚和雅，善于融化诗句”，第六则又称姜夔《疏影》《暗香》《扬州慢》《一萼红》《琵琶仙》《探春慢》《淡黄柳》等词，“不惟清虚，且又骚雅，读之使人神观飞越”。这些对于浙西派尊奉姜、张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① 参见《词汇缘起》，《古今词汇》，《稀见清代四部辑刊》，第5辑第100册，第21页。

② 参见朱丽霞《清代辛稼轩接受史》，齐鲁书社2005年版，第558页。

③ 陆埏《古今词汇序》，《古今词汇》，《稀见清代四部辑刊》，第5辑第100册，第4—5页。

从《见山亭古今词选》《古今词汇》来看，它们都表现出一种超越《古今词统》，树立周邦彦、姜夔、张炎为词史典范，构建雅正词统的新动向。而将这一动向转化为时代最强音的，是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。《词综》就是其雅正论统序观的集中体现，而《浙西六家词》的刻印，则是其传承雅正词统的具体标志。

朱彝尊初为词时，主要取法五代北宋，小令大抵学《花间》，长调则兼取周、柳、秦、黄诸家，这还只是沿袭云间、广陵、毗陵的创作路数。在后来南北飘零的漫游生涯中，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验，逐渐探索出自己的创作道路，提出了“小令宜师北宋，慢词宜师南宋”的主张。他说：“予尝持论，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，慢词则取诸南渡。……魏塘魏孝廉独信予说，频与予倡和。词成，掩其名示人，见者或疑予所作。”^①“窃谓南唐北宋，惟小令为工，若慢词，至南宋始极其变。……读东田小令、慢词，克兼南北宋之长，与予意合。”^②有学者认为这是朱彝尊早期的填词思想^③，其实不然，它实际上是朱彝尊中年时代形成的较为成熟的创作观念。他说小令宜师汴京以前，是对云间派及其创作观念的传承；他倡导慢词取诸南渡以后，则是对清初诸词派创作理念的超越。这可以从《词综》入选词人中（以十首以上为统计依据）得到印证。《词综》收录晚唐五代词人有温庭筠、李煜、韦庄、欧阳炯、李珣、孙光宪、冯延巳；北宋词人有欧阳修、晏几道、张先、柳永、苏轼、秦观、晁补之、毛滂、周紫芝、周邦彦、吕渭老、蔡伸；南宋词人有朱敦儒、辛弃疾、程垓、姜夔、陆游、张辑、黄机、卢祖皋、高观国、史达祖、吴文英、蒋捷、陈允平、周密、王沂孙、张炎。这一入选名单看似是五代两宋著名词人都有入选，但从入选作品数量来看，五代北宋以小令见长的作品入选较多，慢词特别是以典雅格律见长的慢词，则以南宋词人为多。排在前几位的即是其着力弘扬的“浙派词宗”——姜夔、卢祖皋、高观国、史达祖、吴文英、蒋捷、王沂孙、张炎、周密、陈允平等，而辛弃疾（三十五首）、程垓（十六首）、陆游（十五首）、刘克庄（八首）、刘过（九首）等人的入选比例则较低^④。

可见，朱彝尊想通过《词综》表达一个重要理念——以南宋为宗。他说：“世人言词，必称北宋。然词至南宋，始极其工，至宋季而始极其变。”^⑤这里的“世人”指的是云间派及其影响下的清初诸词派，而他本人则想从云间派以五代北宋为宗的统序观中超越出来，建立一种不同于清初诸词派的新统序，“词至南宋，始极其工”。张宏生先生认为，朱彝尊标榜南宋是受到《古今词统》的影响，两者（《词综》和《古今词统》）选人与选篇比较接近，有突出典雅格律的意图，确为有识之见^⑥。但是，朱彝尊的主要意图还是要以姜夔的清雅作风，荡涤中晚明以来词坛的淫褻与粗鄙。如果说《古今词统》是以“委曲”“雄放”互救其弊，那么《词综》则是以醇雅来纠正婉约、豪放二者之失。正如汪森所说：“盖词本盛于北宋，然或失之妖艳，或间杂俚语，或出以粗豪；至南宋姜白石，始扫除殆尽，称为独绝。”^⑦尽管论词尚雅在《古今词统》中也有表现^⑧，朱彝尊却是将它作为一种审美主张提出来，并确立南宋为词史正宗（“极其工”），将姜夔树立为南宋雅词的典范，还以其为中心构建了一个南宋雅词谱系。他说：“词莫善于姜夔。宗之者，张辑、卢祖皋、史达祖、吴文英、蒋捷、王沂孙、张

① 朱彝尊著，王利民等校点《曝书亭全集·曝书亭集》卷四〇《水村琴趣序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455页。

② 《曝书亭全集·曝书亭集》卷五三《书东田词卷后》，第555页。

③ 参见肖鹏《群体的选择：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》，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475页。

④ 这里的入选比例是指词人实际入选作品与其作品保存量之间的比值。

⑤ 朱彝尊、汪森编，李庆甲校点《词综》“发凡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0页。

⑥ 参见《经典传承与体式流变：清词和清代词学研究》，第205页。

⑦ 汪森《小方壶文钞》卷三《故麓集长短句序》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第185册，第448页。

⑧ 参见丁放、葛旭芳《从明代词选看词学观念的演变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08年第6期。

炎、周密、陈允平、张翥、杨基，皆具夔之一体。”^①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其他浙派词人的支持。对此，有学者评论说：“此处以醇雅立义，推姜夔为宗，辅之以南宋中晚期与其词风相近的十数家，系为一派，是词学史上明确为南宋姜、吴诸家正式建立宗脉关系的最早一段文字。”^②更为关键的是，朱彝尊“尚雅”不只是提出一种主张，而且是把以雅为宗、标举南宋、推尊姜夔等一系列要素组合起来，为浙西词派建构了一个体系周密的雅正论词统。他和他的词友们也以传承南宋雅正词统为己任，如李良年“于词不喜北宋，爱姜尧章、吴君特诸家”^③，沈皞日“况之古人，殆类王中仙、张叔夏”^④，龚翔麟“新制大率以石帚为宗，而旁及于梅溪、碧山、玉田、蘋洲、蜕岩、西麓各家之体格”^⑤。

这一统序观念的形成，是当时词坛审美宗尚变化的重要表征：由推崇五代北宋到宗尚南宋，由陈维崧、纳兰性德标举“性情”（“性灵”）到浙西派强调体格“雅正”。从云间派到陈维崧、纳兰性德，在审美观念上以自然为尚；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，则更重视对词体范式的确立，他指出：“词至南宋，始极其工，至宋季而始极其变，姜尧章氏最为杰出。”（《词综》“发凡”，第10页）这句话有两点值得注意：一是南宋词以“工”见长，格律精工，词法圆熟；二是将姜夔树立为“工”的典范，“字雕句琢，归于醇雅”。在朱彝尊看来，尚雅是在宋代已有的一种传统，即所谓“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，是故曾慥录《雅词》，鲟阳居士辑《复雅》也”^⑥。因此他反复声明，作词也要以雅正为宗，他说：“倚声虽小道，当其为之，必崇尔雅，斥淫哇，极其能事，则亦足以宣昭六义，鼓吹元音。”^⑦那么，如何做到崇尔雅、斥淫哇呢？朱彝尊又说：“词虽小道，为之亦有术矣。去《花庵》《草堂》之陈言，不为所役，俾滓麻涤濯，以孤技自拔于流俗，绮靡矣而不戾乎情，镂琢矣而不伤夫气，夫然后足与古人方驾焉。”^⑧所谓“去陈言”，就是追求语言的陌生化，讲求“绮靡”“镂琢”；所谓“拔于流俗”，就是要摆脱俚俗词风的影响，反对浅白直露的词风。他主张要像姜夔那样“字雕句琢”，出辞不陈俗，言情不轻佻，“绮而不伤雕绘，艳而不伤醇雅”^⑨。这就是他所确定的雅词规范，一个是内容上的规范（“绮靡矣而不戾乎情”），另一个是形式上的规范（“镂琢矣而不伤夫气”）。当然，其根本仍在于合乎儒家诗教，诚如厉鹗所言：“词源于乐府，乐府源于诗。……由诗而乐府而词，必企夫雅之一言，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。”^⑩词从乐府而来，乐府又从《诗》而来，故而词传承了《诗》的雅正传统。这一论述不但确定了“雅”为词所固有的审美品格，也从理论上证明了浙派宗法南宋的合理性，使得雅正词统在清中叶以后得到巩固和发展。

结 语

“词统”是一个从辨体批评发展而来、与正变观念相关联、体现着词派审美取向的新观念。它在

① 《曝书亭全集·曝书亭集》卷四〇《黑蝶斋诗余序》，第453页。

② 刘少雄《南宋姜吴典雅词派相关词学论题之探讨》，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5年版，第35页。

③ 《曝书亭全集·曝书亭集》卷八〇《征士李君行状》，第740页。

④ 龚翔麟《柘西精舍集序》，沈皞日著，胡愚、朱刚点校《柘西精舍词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页。

⑤ 李符《红藕庄词序》，《清词序跋汇编》，第1册，第213页。

⑥ 《曝书亭全集·曝书亭集》卷四〇《群雅集序》，第456页。

⑦ 朱彝尊《静惕堂词序》，曹溶《静惕堂词》，陈乃乾辑《清名家词》，上海书店1982年版，第1卷，第1页。

⑧ 《曝书亭全集·曝书亭集》卷四〇《孟彦林词序》，第455页。

⑨ 沈尔燾《月团词》朱彝尊评语，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评卷下，《词话丛编》，第1册，第1049页。

⑩ 厉鹗著，董兆熊注，陈九思标校《樊榭山房集·文集》卷四《群雅词集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755页。

明末清初有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，对于它的涵义应该从三个方面去把握：一个是自明中叶以来就已经确立的正变两体说，一个是从性情论出发确定的豪放、婉约不存轩轻的统序观，一个是在不同统序观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词史盛衰变化的认识。然而，无论从哪个层面去理解，都有两个核心要素：统序的选择与观念的传承，最能体现这两大要素的是词派与词选。词选作为一个时期思想观念的载体，遴选了不同时代的典范词人和经典作品，体现着不同词派的统序观（包括体性观和词史观）。因此，本文从观念史立场出发，以明末清初重要的词选或词派为切入点，力图呈现出一种作为观念的“词统”，是如何在明末发端再到清初逐步形塑的。我们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本色论到性情论再到雅正论的建构过程。在此过程中，《古今词统》和云间派对清初诸词派统序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[作者简介] 陈水云，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。出版过专著《清代词学思想流变》等。

(责任编辑 马 昕)

· 学术信息 ·

“2021 青年学者词学研讨会”暨词学青年学者同人会召开

2021 年 10 月 23—24 日，由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的“2021 青年学者词学研讨会”暨词学青年学者同人会第五次会议在天津召开，近二十位青年学者与会，会议特邀王兆鹏、彭玉平、孙克强三位词学研究专家担任评议嘉宾。会议围绕以下两个核心议题展开：

一是“经典重读《东坡乐府》”。王卫星（中山大学）认为苏轼成为变体词宗的关键是其在常用词调中注入了变体劲风。叶晔（浙江大学）以苏轼“水龙吟”调为起点，梳理其后历代同调之在体式、声情、题材等方面的传承演变。刘学（中南大学）认为苏词接受了北宋曲体的渗透，但又与曲体畛域分明。江合友（河北师范大学）阐释苏轼词创作突破调、韵传统，整合了体、意、气、辞等特征。傅宇斌（云南师范大学）梳理总结苏轼杂体词的基本类型及特点。赵惠俊（复旦大学）认为明刊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所收词作呈现出依地汇聚的系年特征。汪超（武汉大学）考察《东坡乐府笺》的校勘过程与方法，揭橥其与《傅幹注坡词》的异同。杨传庆（南开大学）论析了词学史上的东坡绮语词批评，并揭示其与各时代词学追求的密切关联。

二是“清代词学研究”。张海涛（天津中医药大学）立足词调“三分法”，认为清初对长调的钻研，直接促成了浙西词派的风会转移。曹明升（扬州大学）以清代“性灵说”为例，阐明词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对应和错位。陈昌强（苏州大学）探讨南北宋之争在清代词学中融汇与消解的过程。郭文仪（中国人民大学）考索词体对“西方经验”隐蔽的回应过程，探论词体“缺席”背后的审美惯性。刘少坤（河北大学）全面梳理了“律校法”兴起发展的脉络。此外，李飞跃（清华大学）探讨了“天宝十三载”改诸乐名的原因、方式、取向等问题。符继成（湘潭大学）以“词味”说为例考察诗学话语向词学话语的转化。徐燕婷（华东师范大学）以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为核心，构建了 20 世纪 30—40 年代的女词人微生态圈。咎圣骞（江苏师范大学）论述了北京大学词学教学关注词体音乐属性的特点。和希林（河南大学）梳理《梦桐室词话》的成书过程并总结其中的学术精神。

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青年学者的学术气象，并从文章撰写的精度与深度等方面提出期待，鼓励青年学人勇于解决词学难点、焦点问题，形成属于新一代学者的学术特点。

(南开大学文学院 王 平 杨传庆)